

中国清代俄语教育与人才培养

王金容,夏宏钟,杨德洪

(四川理工学院 外语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摘要:中国俄语教育始于18世纪初,清代俄罗斯文馆的建立标志着它的开始。以后出现的京师同文馆及晚些时候的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是其阶段性标志。这些俄语教育机构的变更同时也伴随着其培养体制和模式的演变。而这种演变体现在其起始背景、组织规模与形式、师资来源与任用、分布与布局、学生来源与录用、培养内容与目标等方面。回顾清代俄语教育历程与人才培养,厘清其优劣,探讨问题,有利于当今外语专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清代;俄语教育;“三馆”;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3)06-0049-05

一、清代俄语教育之“三馆” ——俄罗斯文馆、同文馆和译学馆

据记载,中国俄语教育之初创和起步是在清代。俄罗斯文馆的成立(康熙 47 年)是初始标志。当时,清朝和俄罗斯外交和贸易往来不断增加,意识到与俄方交往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为了更好地得益于这种交往,应对其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了解交往方的文化和习俗,通晓其语言就凸显其必要了。为了方便好用,防止对方欺诈,将培养俄语人才提到议事日程。1708 年,按康熙意旨,在当时俄国商团驻地俄罗斯馆(北京东直门以北胡家圈胡同),设立第一所俄文学校——俄罗斯文馆。不久,又迁址左翼马市西北大佛寺^①。文馆选用俄方商人做教习,且任职时间不长,最短的不到一个月;第一批学员少,全部选录八旗子弟。这说明第一所俄文学校在教习的选用、校址的变更、生源等方面都有较大局限性、不稳定性和随意性;尽管诸多事宜尚未解决,条件尚不成熟,但在实际需求的助动下,官方正式运作俄语教习,标志着中国外语教育的开始。俄罗斯文馆自

成立起,不断壮大教习队伍,为清朝政府培养更多通译人才,中俄教习合作编译中国第一本外语教科书:俄语语法书,名为《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②。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文馆增设它语种。俄罗斯文馆的葱草上马到不断发展壮大,为时长且缓慢,但其社会效益和影响作用不可低估,其体现的适用和应时而变的思想值得目前的外语教育改革借鉴。

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枪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清朝大门,同时也震惊当朝上下及国民。为保住其统治不得不与列强交涉,赔款割地丧权辱国,国将不国,泱泱大国命运堪忧。现实说明中国封闭太久,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为此,一批“洋务运动”分子应运而生,积极鼓动了解、学习西方语言文化和技术。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当朝设立总理衙门,力推办校,学习西方语言、技术等。尽管还有保守势力的阻碍,但 1862 年官办外语专门学校——同文馆(全称: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幸运而生了。其初衷:“急用现学”培养满族外语通译人才和洋务人才。其教习主要是外国人,初设英文、法文和俄文,后续增加德文、日文以及一些自然科

收稿日期:2013-08-10

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重点项目(SCWYH10-06);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SC12WY017)

作者简介:王金容(1965-),女,四川仁寿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俄语教育与语言文化;

夏宏钟(1965-),男,四川仁寿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外语教育和英语语言文化。

网络出版时间:2013-10-29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676.C.20131029.1330.010.html>

学的课程^[3]。同年,俄罗斯文馆并入新创立的京师同文馆,走过了一百五十四年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同文馆——在列强枪炮声中孕育、诞生的外语教习馆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4]。同时,自喻“天朝”大国的保守自闭状态开始改变,落后与挨打等现实问题迫使当朝打开国门,了解世界,学习它国先进的文化技术。显然,外语学习成为一把打开中国通向世界大门的钥匙。四十多年以后,于1902年同文馆并入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1911年更名北京大学),改名为翻译科。次年,设立译学馆,翻译科并入。主要教习外国语言和文字,辅以外国文学课程。至此,高校外语系的雏形显现出来了。与译学馆并存的仕学馆和师范馆设英、法、德、俄、日,学员可任选一门学习。另外,预备科要求外文是必修主课,政科还开设俄文,周学时七。

简言之,俄罗斯文馆始于三百多年前,历时一个半世纪多,语种单一、教学和学员来源与规模、课程设置等有限。但是它毕竟应需而生,成为中国外语教育的开始,为同文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政府处于内忧外患、丧权辱国的势态下,不得不应急现学,借鉴俄罗斯文馆旧制于1862年建同文馆,历时四十余年。其规模虽小,但是生源扩大,招收汉族学生和扩大招收学员年龄,学制由三年变为八年和五年,课程设置也在最初的英、法、俄、汉基础上增加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天文、物理、医学生理等。到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更名京师译学馆,其课程设置发生了变化,专修语言文字,辅修目标语文学。这直接影响后来外语专业的发展走向,甚至可以说为近十几年高校扩招,导致外语专业,尤其是英语专业毕业生就业和分流困难埋下了伏笔。

历查史料,以“三馆”为标志的漫长俄语教育尝试和实践,培养很多通译和洋务人才,也为以后的外语教育奠定了基础。认真分析清代俄语教育在起始背景、组织规模与形式、师资来源与任用、分布与布局、学员来源与录用、培养内容与目标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潜在的弊端,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值得反思^[5]。

二、清代俄语教育机构与体制模式演变

中国第一所官方俄文学校——俄罗斯文馆是中国正规俄语教育的开端,其管理制度从无到有,逐步规范,比较严格。招收俄罗斯人和汉人做俄语、汉语教习,学员主要为八旗子弟,学习俄文和拉丁文。由于晚清洋务运动的兴起及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式要求,在原俄罗斯文馆的基础上,京师同文馆,增设英文、法文、德文和东文。由于洋务运动的逐步影响,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

纷纷建起来了。陆续建立多所俄语教习机构。北方有:黑龙江俄文学堂、珲春俄文书院、新疆俄文馆;南方有:广州同文馆、天津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官办,是第一所多科性综合大学)后,更名为翻译科,次年又并入新设立的译学馆,开设英、法、俄、德、日文等五科。京师大学堂的俄语教育课程设置有三类:外语辅助课——归属其它专门学科、俄国文学专业——归属文学科、俄文教育——源于京师同文馆。译学馆聘用中外教员,招收中学堂毕业学生,进而形成了当代外语系(学院)框架和专业课程设置走向。此外,1904年“癸卯学制”的制定和颁布也促进了中国俄语教育在京师和地方各级各类学堂的发展。

为了造就通用人才,清政府三次制订和修订办学章程。1898年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的办学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四年后,《钦定大学堂章程》提出了办学纲领“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紧接着,在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提出“为教授各科学理法,俾将来可施诸实用之所”,“研究各科学精深义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章程》明确且详细规定大学堂之办学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等,体现出仿西方办学逐步完善的过程。据记载,由于刚起步,各种不利因素,如:师资、教材、生源素质状况等的影响,其人才培养效果不佳。然而,究其积极作用,完成了中国近代沿袭多年的人才教育培养体系的变革,初步搭建和形成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模式,极大涉及和影响晚清的社会发展与此后的中国文化教育和中外文化交流。

清朝俄语教育在明代旧制基础上演变而来,大致为:旧式中央官学教育、新式官办学堂教育、学院教育和留学教育,也可分为: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和书院三种形式。俄罗斯文馆为旧式中央官学,设有国子监和一些特殊性质的宗学、旗学、觉罗学,算学馆和俄罗斯文馆,隶属于清廷理藩部,学生来自于八旗贵族子弟。由于洋务运动的影响,中国最早官办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作为教育机构,又起到政府机构的作用,隶属总理衙门,标志着中国洋务教育的开端^[6]。京师同文馆在俄罗斯文馆课程设置基础上,增加较多的自然科学知识,进行班级授课。由于受国外资本主义的影响,清政府开设的同文馆具有封建和殖民地双重性质,具有新式教育的特征。其创办初衷、学制、管理、课程设置、学生的招收和教师的聘用等诸多方面都仿效西方新式教育。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多科性综合大学自然受资本主义影响更大。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俄语教

育步入了学院教育时代。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是对封建社会传统教育的挑战,但是呈现浓烈的封建色彩。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派遣选出的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费用由中央、地方政府或本人出,但是数量太小,只有三十多人。此数量虽小,却不失为一条有效的培养途径。

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体制的影响,中国清代俄语教育逐步迈上正规的道路,接受政府管制和拨款。1905年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成立统管全国教育,派驻政府官员参与或指导学校管理,并在管理、生源、考试奖惩制度等方面给予指导或导向。在此基础上,各学校都设立和制定严格规章制度,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行。比如,考试方面设有月课、季考和岁试,按五年一次的大考成绩授予官衔。据史料记载,京师同文馆和地方方言馆的俄文教育大致沿用或仿效俄罗斯文馆旧制。由于国外教育思想与模式的影响,逐步制定和完善办学章程和教学管理制度^[6]。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多科性综合大学,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办学经验的基础上,京师大学堂不断改进教学与管理模式,逐步迈进现代大学,如采用积分制、扩大招生来源(除贵族子弟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学)。并规定中学堂毕业生为其生源学校,高小毕业生只能进入高等学堂和中学堂。这些改革其实就是迈向现代教育体制的第一步^[7]。与此同时,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因涉外事务较多而设立的俄语学习机构也不少,如新疆俄文馆、珲春俄文书院、黑龙江俄文学堂等。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国大学堂、各省高等学堂和中学堂大多设置包括俄语在内的外语课程。大学堂还设置各类外语的专业课程或辅助课程。各省高等学堂及中学堂的外语课程设置要接受全国统一规划,并充分考虑各地的特殊情况。《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除了的确需要开设俄语的地区和省份外,如东北、新疆,其他均统一以英语为主。当时开设俄语的有吉林外国语学堂、奉天方言学堂、黑龙江呼兰县俄文学社、湖北澍君方言学堂和江西方言学堂等。湖北汉口的华俄商业中学堂就是为满足当地需求而开设的。汉口作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各地包括俄国的商人和企业,俄商在这里设立茶厂,开办茶行,设置代办处,进行茶叶收购、加工和运输业务,贸易业务往来使得俄语翻译人员成为急需,华俄商业中学堂应运而生^[8]。

清代中国俄语教育机构的地域设置变化随应国家和地方需求,也是洋务运动的结果。初建时期,俄语教

育主要集中在外交事务的中心——京城,主要是为了培养解决中俄外交上的语言障碍的翻译人才。另外,统治者不信任普通平民,怕泄密,只招收贵族子弟。但是,鸦片战争后清代俄语教育在地域和生源上急剧扩大了。洋务运动促成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这个时期俄语教育机构地域分布主要在中俄边境通商口岸、外交事务多的地方。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外教育思想、理念和教育模式、体制的影响,也是当时国内发展形式之需。

三、清代俄语人才培养

前文已述,清代的俄语教育最初不论是从创建背景还是设置的课程都是为了培养外交需要的翻译和外交人才,解决两国不能正常沟通交流的问题,以避免由于语言不通造成的误解和隔阂甚至矛盾。但是在同文馆创立后,培养俄语人才的利用目标更高,也逐步注入政治色彩,要培养通晓洋务的通用之才,从而达到“悉夷”、“师夷而制夷”。俄罗斯文馆建立的背景就是康熙帝为了解决中俄语言文字不同这一障碍,减少交往的不便、误解和吃亏而钦点建立的。俄罗斯文馆初始招收范围小、学员少,以后逐步扩大,学员逐步达到一百二十多人。外语课程多由临时招聘外国人承担。俄文馆初期的俄语教习主要依靠俄商和在华定居的俄罗斯人,主要教授语音和口语,但是语法和其它方面知识欠缺,不能很好胜任教学。而且教师流动性大,多为短期,最长的也只有几年就辞呈了。所以师资问题是当时最大的难题。可以这样讲,当时的俄语教育只能是勉强维持而已。在1715年第一届俄国宗教使团来到中国后,传教士和留学生成为俄语教习主要来源。该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20年代,主要任用毕业生做教员。因教学内容太成就,教法呆板导致教学质量甚差,毕业生质量可想而知,俄语语言掌握肤浅,不能胜任翻译。期间清政府为了让学员坚持学习曾给每人授一职位,让学生亦工亦读。这种做法在当今看来虽与初衷相悖,却是教学意义上的言语实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学员在校学习费用由政府承担,还得十两白银的薪水。学习要求严格,有月考、季考、岁考和三年一次大考。按学员考试成绩,好的官阶得以提升,且安排工作和职位(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学堂教习);稍差不合结业条件的继续学习;太差无法学好的辞退^[9]。

鸦片战争的失败大大刺激了大清统治阶层。一部分统治者认识到中国闭关自守太久,对外交往和认识太少,西方国家已在各方面优于当时的大清帝国。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学习国外科技技术,进而语言学习就

成了必然。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洋务运动,同文馆也就幸运而生。1862年外务大臣奕新表奏当朝,设立同文馆。同文馆成立之初不但开设俄文,还增设法文和英文,但是课程只涉及文字和语言。正如奕新所讲:“俟八旗学习之人,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止”。但是,到了1866年,奕新在同文馆经历五年办学过程后又提出,除语言教学外另增设天文、算学。次年,同文馆加设天文和算学两馆,实施八年学制。到此,同文馆的课程得到大幅度增加,涉及更多自然和社会学科内容,如:各国史略、万国公法、数学、化学、天文测算、航海测算、地理等。不管此变革是为了‘急用’,还是顺应时代潮流,此举至少带动了全国各地更多的学堂设立自然科学和更多的社会科学课程,如湖北自强学堂增设数学、商务、化学、兵操等十余门课程,上海广方言馆增设数学、几何、天文、地理、绘图、矿物冶金金属铸造、木铁器制造、机器设计与操作、行海理法、水陆攻战和外国风俗国政等课程,广东同文馆加开地理、历史、天文、算学等课程。可以这样说,同文馆人才培养内容和课程设置的变革是现代大学建设的奠基。其结果不言而喻,单一的文字语言教育转为自然科学和更多的人文学科教育。培养人才也从单一的语言翻译转变到多学科的通用之才。值得一提的是,此间留洋学员也不再只习语言,还要选学其它课程,以备回国传授他人和效力。这是当代外语专业建设和改革的可效典例。

在课程设置上,清代俄语教育初期主要是语言,到京师同文馆时期曾设历史国情和自然科学。语言课程为语音、口语、语法、翻译、言语实践。头两年主要教习俄语语言,包括语音、语法和简单的翻译练习;各国历史、地理等在第三年开始教习;其它学科在后五年进行教习。在八年的教习过程中俄语始终是重点,翻译自始至终是重中之重。1898年同文馆续增的条规明确指出:“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从简到繁,贯穿八年的学习。值得一提的是,学生还可以通过要件、电函、洋文件、洋文报等进行翻译训练。除正常在馆习读之外,学生还有其它练习机会:到总理衙门旁听外国使节会晤,随便出洋,兼任政府部门译员等直接参与外交事务活动,优秀学生还可以兼任副教习^[9]。可以看出,重视目标语的实践和练习是当时俄语教习的一大特点。当今扩招后的外语专业学生实习见习方面却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这一优势了。此外,同文馆在教习外语语言的同时,高度重视汉语学习。用一半多的时间学习汉语,以促进外语学习。此法得到全国各地外语学堂认可,得以推广运用。

编译书是京师同文馆的教习工作重点之一。同文

馆设翻译处等,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国际法、经济学等书二十余种。最初由总教习与洋教习在课余完成。后来规定学员从第五年开始(八年制)译书实践活动。编译书工作逐步就主要由师生合作完成,偶有学生独立完成。译学馆还设立专门从事词典编写工作的文典处,编辑出版了一些保障外语教学、外交外贸事务和书文报翻译的文典。直到1746年,通过俄教习和汉语教习的共同努力,翻译编撰的第一本俄语教科书《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编译自斯莫特利茨基的《俄语语法》)才得以问世。京师同文馆图书资料有3700汉语和外文书籍(外文为1900本),学生可以自由借阅。教科书有外国原版的,也有一些是教习自己编纂或翻译的。

四、结 语

清代中国的俄语教育大体以“三馆”为标志一路走来,历时三百余年。“应需而生”、“急用现学”、“通用之才”反应出中国俄语教育的无赖之诞生、葱草之苦痛、成熟之艰辛。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得益于当朝的重视,其起步就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机构,目标也十分明确。通过多年的努力和调整,到清末,俄语教育体制与模式和人才培养已走出“专门的俄语翻译人才或外交人才”这一局限,为研习其他学科而立了。应该说这是当今培养外语复合型人才的雏形。其教育目标在一定程度的实现得归功于官方或政府的主持和支持,应需而设,给予承诺,且条件待遇优厚;自始至终把翻译能力的培养视为重中之重,并通过现场见习和实践训练等来实现;通过生源、课程的安排和考试等保证学员汉语的学习及水平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实现设想目标,主要由于当时的封建社会背景,其闭关自守和天朝上国思想阻碍这一稚嫩的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多数学员学习俄语的目的仅仅是为仕途发展;师资问题、教材陈旧与匮乏极大影响俄语教育的发展进程。清代俄语教育的诞生、发展和壮大经历了长时曲折的道路,是其时代背景所致。但是政府、行业及相关人士的努力使得其逐步发展和提升,为以后的外语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提供借鉴经验^[10]。清代俄语教育发展历程不得不让我们深思,探究在新形势下中国外语专业发展走向及改革与措施。

再者,俄罗斯文馆最初学制为三年。通过一百多年的实践和摸索,也由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于1876年改为五年和八年,后者加设天文和化学等自然学科。其八年和五年学制是在三年基础上通过实践演变而来,还是比较有理性和实用的设计。与目前的三年和四

年学制比较更加科学和实用。原因在于,外语学习不应是单一的语言技能培训,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有助于学员知识领域的扩展和多岗位就业。再者,学好一门外语,三、四年的时间太有限(个别很优秀和特别喜爱外语的学生除外,可以分类对待),更不要说加入其它学科课程。当前的外语专业改革方向大体上是在课程设置上变更,既增设一些其它专业的课程,其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多专多能,便于就业^[1]。回顾一下,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语专业的快速发展的确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外语人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求的变化,外语人才凸显过剩,分流困难(在岗和即将上岗的外语工作人员)。一些所谓的大语种(与小语种比较而言),如英语人才就业困难,成为被亮红牌的专业。出现这种状况与当初的外语专业课程设置不无关系。更令人担忧的是,至今很多学校外语专业招收人数多、课程设置仅限于语言技能和文学课程(这应该只是外语专业课程设置之一种)。如果要进行外语专业改革,增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应该考虑延长培养年限和增加实习和实训量。否则,培养出来的大部分学生会多专低能,一样不好找工作,不受社会欢迎。这一问题看似简单,但是需要国家政府政策指引、社会认可。学校要积极主动,抛开当前的经济利益,着眼于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 [1] 郝淑霞.中国俄语教育的最早尝试——俄罗斯文馆[J].中国俄语教学,2005,(1):57-60.
- [2] 肖玉秋.清季俄罗斯文馆延聘俄人教习研究[J].史学月刊,2008,(12):80-88.
- [3] 王金容.中国俄语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探析[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95-98.
- [4] 张路莹.试析丁黉良与京师同文馆的创办[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5):91-92.
- [5] 韩莉.清代中国俄语教育述评[J].西伯利亚研究,2010,(1):42-47.
- [6] 刘华.论京师同文馆的高等教育性质[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22-29.
- [7] 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85.
- [8] 赵振江,韩凤祥.京师同文馆:始时仅学生十人入学每月发薪十两[EB/OL].(2009-5-24)[2010-1-6].<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05-24/1705227.shtml>.
- [9] 朱有璩.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G].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
- [10] 王铭玉,孟霞.中国俄语教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方略[J].俄语语言文学研究,2005,(3):1-13.
- [11] 王金容,夏宏钟.中国俄语教育建国初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与反思[J].中国俄语教学,2011,(2):5-8.

责任编辑:陈于后

Russian Education and Russian-based Personnel Training in the Qing Dynasty

WANG Jinrong, XIA Hongzhong, YANG Deho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the setup of the Russian School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Russian education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in the Qing Dynasty. Many years later, the Imperial Tung Wen College of Peking and the Translation Department of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appeared. As these Russian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hanged, the Russian education system and mode chang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background, scale, form, teaching faculty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students enrollment, training contents and goal, etc. Recalling the Russian educa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is supposed to help realize its good and bad, probe the problems, therefore, benefi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Russian education; the three Russian-training institutions; personnel training